

存在的焦虑：

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与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互文对话

金英明*

目 录

- I、引言
- II、《一个人的圣经》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故事梗概
- III、《一个人的圣经》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互文对话
- IV、结语

I、引言

高行健自2000年度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受到全世界中文学界的关注，在韩国也不例外。高行健在戏剧、小说、绘画、文学理论、电影等诸多方面建树，因此较之于只创作一种题材的其他中国当代作家，其研究空间更为广阔。2011年5月28日，在韩国高丽大学举办的“高行健：韩国与海外视觉的交叉与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朴宰雨、林大根、杜特莱(Noël Dutrait)、潘耀明、饭塚容分别对在韩国、法国、香港、日本的高行健作品翻译、接受及研究做了梳理，本研究者硕士论文中，也曾经对大陆及台湾的高行健研究做了补充。而最近又出现新的研究趋向，即对高行健的电影¹⁾、与韩国作家的比较²⁾、对《灵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

- 1) 林大根, <高行健电影论>-以《侧影或影子》与《洪荒之后》为中心>, 现代电影研究, Vol. 13. 2012
- 2) 金英明, <高行健与李仁星小说比较研究-以创作技巧为中心>, 韩国中文学会, 2012. 5

山》所见中国源流文化研究³⁾也开始出现。这说明，韩国的高行健研究超越仅对文本解读的初级阶段，开始走向总体把握高行健创作世界的深层阶段。尽管如此，也有顾及不到的层面，即与法国文学或者与法国有关作家之间的影响关系。高行健50年代开始接触西方及法国文学，90年代初开始移居法国，因此法国是研究高行健的重要关键词。不过这对于韩国的中文研究者来说是一种双重负担，有所力不从心，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本论文将尝试此方面研究，通过与米兰·昆德拉作品的对话，发现他们二人作品世界的交集处有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共产主义、专制、革命、流亡、政治、性爱、自由、个人等是高行健与米兰·昆德拉作品相互重叠的部分。

本论文通过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与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互文对话，探讨20世纪流亡于法国的高行健与米兰·昆德拉所焦虑的存在及生命之意义。

文本间性又叫互文性，是1966年克里斯蒂娃以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为基础提出的这一概念。她在《符号学：解析符号学》一书中提出，在随后的《小说文本：转换式言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中，她以一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互文性”概念的内容。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过去的文本和现在的正在创作的文本相互联系着。“每个文本的外观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但‘互文本’绝不能被理解为摘抄、粘贴或仿效的编辑过程。”(Kristeva1984:30)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掌握文学作品的“涵义”是主要目的，当时将此“涵义”与“作者意图”等价来看待，即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如何更加贴近“作者意图”，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中作者的权威是“绝对的”，作者掌握评价读者或评论家水平的“尺度”，因此与作者的关系中，读者总是居于“从属”地位，读者的自由受到限制，文学研究者与作者的关系是寄生关系。对此，1968年罗兰·巴特发表了著名的《作者之死》。《作者之死》彻底瓦解了传统的作者主体地位，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人，而仅仅是一个临时的表述者。罗兰·巴特认为“文本是由

3) 김영명, 『「靈山」에 나타난 始原文化 研究』,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석사논문, 2012. 2

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中略）作家只能模仿一种总是在前的但又从不是初始的动作；他唯一的能力是混合各种写作。”⁴⁾“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⁵⁾“一个文本是由多种写作构成的，这些写作源自多种文化并相互对话、相互滑稽模仿和相互争执。”⁶⁾罗兰·巴特还解释道：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本研究者在阅读《一个人的圣经》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也确实发现这两个文本的相似性，通过互文对话，引出中西文化的对话，却惊人地发现，高行健和米兰昆德拉所要表达的普世价值乃是对生命的把握及对存在的叩问。

II、《一个人的圣经》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故事梗概

高行健1940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教会的业余演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虽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但高行健相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并且通过母亲潜移默化地对戏剧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⁷⁾1950年高行健全家搬到南京，就读于南京第十中学（以前是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高行健接触到许多西方翻译来的作品，1957年高行健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1962年大学毕业以后，高行健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对一个人来说，20岁以前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可以说，23岁以前的高行健是在思想相对自由、开放的家庭、社会环境

4) 罗兰·巴特，〈作者之死〉，《文之悦》，东文选，第32页（韩文版）

5) 罗兰·巴特，同上书，第33页

6) 罗兰·巴特，同上书，第34页

7) “母亲曾经是演员，也很喜欢文学，我五岁时便和她同台演出，这是我的第一个舞台经验。可以说在我出生之前便承受了她的胎教，后来她在家教我读书写字，使我从西方的童话故事开始，很早便在文学创作上有比较开放的视野。”（〈高行健专访〉，台湾联合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日，第三版）

中成长，这为他以后的价值取向及创作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1970年高行健下放到农村，1987年流亡到法国。在这21年间高行健要生存于与前二十几年的价值体系完全不同甚至决裂的社会环境中，因此高行健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实现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对话，并强烈否定1949年以来的文艺政策及方针。

虽然高行健被西方报纸评为“当代最有前途的剧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法译本轰动法国文坛，被法新社评为：本世纪末中国文学的里程碑”⁸⁾，并2000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高行健依然被拒绝于祖国之外，他的作品也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

高行健擅长用现代主义技巧写作，但在《一个人的圣经》中用“极端的现实主义”⁹⁾来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极端’的另一意思是拒绝停留于表层，而全力地向人性深层发掘。”¹⁰⁾《一个人的圣经》描写的是中国当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年代和英雄主义年代，一个脆弱个人的尊严、人权、个性、自由等是如何被蹂躏的。

《一个人的圣经》是高行健从1996年-1998年在法国完成的，发表于1999年，被称作《灵山》的姐妹篇。《灵山》的主要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80年代，把高行健在长江流域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童年的回忆和想象，通过意识流编织在一起，超越时空如实地记录下来，虽有一些有关文革的叙述，但不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而《一个人的圣经》整篇都在讲述一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一个人的圣经》共分为61章，“小说故事从香港回归之际出发，主人公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邂逅，从而对大陆生活的回忆。绵绵的回忆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童年开始，然后伸向不断的政治变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

8)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联经，2011，封面

9) 刘再复在《一个人的圣经》“跋”中，把该作品命名为“极端的现实主义”，刘再复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是被逼上文学舞台的。“艺术革命走到尽头了，前卫游戏也玩到尽头了。高行健看清了形式革命的山穷水尽，因此他告别了“主义”，也告别了革命和艺术革命。他的“极端现实主义”，就是在上述这种思路的“轰毁”之后选择的新路。”（刘再复，〈跋〉，《一个人的圣经》，同上书，第454页）

10) 刘再复，〈跋〉，《一个人的圣经》，同上书，第453页

和出逃，之后又浪迹西方世界。”¹¹⁾人称从《灵山》的“你”、“我”、“他”三种人称缩减为“你”和“他”，因为“我’被严酷的现实扼杀了。”¹²⁾《一个人的圣经》从大的角度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武斗和男主人公家族的没落，另一条是男主人公在文革中暧昧的处境及与几个女子的情爱。最后这些女人都离他而去，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诚如高行健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祖国，无所谓故乡，父母双亡，又没家室，了无牵挂，孑然一身，倒也轻松。”“这内心的声音成了对自身存在的确认，他已经习惯于把感受变成言语，否则便觉得不够尽性，这给他带来的快感如同做爱时呻吟，或是喊叫。”¹³⁾ 所以，它是“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自己的“圣经”，不担当救世主，只救自己的“圣经”。小说的主人公辗转于中国大陆的南与北，然后移向香港、法国、意大利等国，把西方的各种文艺作品、爵士乐、古典音乐及美术编织在一起，本身也是互文本，与西方文化相互对话。

较之于高行健，米兰·昆德拉更早成名于世界文坛。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市，1948年到首都布拉格读大学，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1968年被称为“布拉格春天”的捷克民主自由化运动，被苏联军队镇压而告失败，昆德拉本人也从教授职位撵了出来。1975年移居法国，他很快便成为法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昆德拉的父亲是钢琴家，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可能是家庭的熏陶，昆德拉显示出了多方面的才华，他既是诗人，也是戏剧家和评论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的代表作，被拍成电影，中文电影名字叫《布拉格之恋》。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和第一个妻子一起生活不到两年，前妻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婚姻失败，托马斯既渴望女人又畏惧女人，因此发展出一套所谓的“性友谊”应付他众多的情妇。六次的偶然性使他爱上一个餐厅的女侍——特蕾莎，他对她的爱违反了他制定的原则，甚至娶她

11) 刘再复, <跋>, 《一个人的圣经》, 同上书, 第451-452页

12) 刘再复, <跋>, 同上书, 第452页

13) 高行健, 《一个人的圣经》第56章, 同上书, 第419-420页

为妻，但是托马斯灵肉分离的想法丝毫没有改变，依然游移在情妇之间，对一心一意爱他的特蕾莎是一种伤害。特蕾莎经常在极度不安的梦靥中醒来，经常猜忌与怀有恐怖想像。此时苏军侵占布拉格，托马斯由于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被迫辞掉医生的职业，当了一名擦玻璃工。后来他们去乡下生活，特蕾莎感到幸福，在一次参加小镇的舞会后，第二天回家的途中二人死于一场车祸。而托马斯的情妇之一萨比娜想摆脱祖国和历史的阴影而自由自在生活，追求安定生活的弗兰兹被萨比娜的轻盈生活所迷惑。

小说的结构也大致可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托马斯与众多女性的情爱与特蕾莎的感情纠葛，另一条是通过轻与重，灵与肉的探讨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小说是以“布拉格的春天”为母题。小说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和第5章是“轻与重”，第二章和第四章是“灵与肉”，题目一样但内容有差异。并且这“七”为基础的建筑结构技术图，配上交响乐时间的安排，以黑色幽默书写着人间的性爱与政治，存在与死亡，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本身就是互文本，与尼采、托尔斯泰、巴门尼德、卡夫卡进行对话。

Ⅲ、《一个人的圣经》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互文对话

1. 存在的焦虑

回首二十世纪的世界是暴力与屠杀蔓延的时代，“触及的国家之广，受害者之多，前所未有的，如今人都承认。从阿尔明尼亚的种族灭绝和消灭犹太人，到南京大屠杀，乃至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和卢旺达的屠杀。”¹⁴⁾人类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但依然不能容忍与己持有不同政见的他人，把自身的利益高高凌驾于他人的痛苦之上，甚至消除异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谋求沟通与对话。卡夫卡的《变形人》正是描写被社会和家庭异化的一个个体的生存困境，对存在提

14) 诺埃尔·杜特莱，〈序言〉，《一个人的圣经》，同上书，第1页

出了叩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难和死亡的人数达三千多万人，苏军入侵布拉格后遇难和被肃清的人数达50多万人。高行健和昆德拉都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的劫难，尼采宣布神的死亡，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却开始了英雄主义时代，高度集权之下，个人的存在如同大海中的一粒沙粒。引用高行健的话是：“你其实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丑，这全面专政无边的簸箩里不由自主弹跳不已的一粒豆，跳不出这簸箩，又不甘心被碾碎。”¹⁵⁾《一个人的圣经》中用摄像头、监视、圈套、窃听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用手枪、飞机、监视、监狱、装甲车等来说明无处逃离的生存困境和高压的专制统治。请看引文：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

你出示证件走进大陆官方的酒店，马上就输入大堂服务台的电脑。那位领班和柜台小姐听你这一口北京话似乎颇感困难，可几个月之后香港回归祖国，他们大概就得改说京腔，还没准正在补课。掌握旅客的动向是他们的本分，老吕如今既已转头官府，你刚才这番赤裸裸做爱的场面，没准就已登录下了。再说，偌大的酒店为安全起见，多装些摄像头不扛花这钱。(2:8) ¹⁶⁾

当时那个小隔间则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冬天装上取暖煤炉和铁皮的抽风管道之后，再多一个人在房间里都难转身。简单的藤墙后面，那对工人夫妻夜里行差事和婴儿撒尿全都能听见。那院子还有两户人家，公开的自来水管和下水道都在院里。那姑娘每次夹的小屋都在左右邻居监视下，你得让房门出气，不是洋扯，便是喝茶。你结婚十多年来一直令你的妻子通过作家协会的党委就抄给居委会调查过，党什么都要管，从你的思想、写作到私生活。(3:18)

也许是个陷阱，对这一派的什么人对你设下的圈套？那就正在关注你的动向。你总觉得就在监视中，（口略）“大检举，大揭发，把那些尚在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35:290)

你想想的爱她，无论如何得活下去，一脚踏车准备好那些话却无法出口，这深夜北京打去的熟悉又陌生的话，那山西吕梁的小县城里谁接电话一定在听，你不能答借茬来什么嫌疑，让人误以为她有什么事。

15)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35章，同上书，第278页

16) 2:8是指第二章：第八页。《一个人的圣经》文本是2011年联经出版社出版的文本。以下同。

(36:292)

这清明的日子，山下还就有眼，就窥探，注视，在监视你。迷雾的亮光里到处是陷阱，就等你一步失误。你不敢开门推窗，不敢有任何响动，别管这静谧的夜人都睡了，一松惶失措，包围埋伏的没准就一拥而上，捉拿你凶案。(44:342)

众人万万想不到，冲锋枪和机关枪一阵阵扫射和点射，点射和扫射像是炒豆，又像是放鞭炮。众人如丧家之犬，山下纷纷逃窜，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赶紧作鸟兽散。(58:432)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

她常在街上转，手里拿着照相机，还给外国记者发胶卷，那些记者至关重要。一天，她胆子实在太大了，竟然贴近一个军官，拍下了他用手枪对准游行人群的镜头，她因此而被捕，在俄军司令部关了一夜。但他甚至威胁要枪毙她。(1:12:30) 17)

从占领第一天起，俄国飞机便整夜整夜在布拉格城市上空飞。(1:17:42)

在共产主义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是一项基本且长期的社会活动。一个画家要获准参展，一个公民要得到签证去海边度假，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要被召入国家队，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关系，再拿各式各样的有关证明（门票的，工作单位的，公安局的，党委部门的，企业委员会的），然后文日专门指派管辖此事的官员对这些证明加以综合、评估、复宜。(3:4:115) 18)

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和装马车，这些词语对她而言是恶毒的，丝毫没有任何浪漫气息。(3:5:124)

自俄军占领托日斯的国家三年来，布拉格发生了很大变化：托日斯在街上遇到的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些人。留一些的朋友都移民走了，留下的人当中有一些都死了。这个事实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俄军占领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之从未如此频繁过。（省略）进入火化馆，托日斯简直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事情：六斤被照得好像拍摄场一样。他惊奇地看了首周围，发现六斤的三个车都装上了摄像机。不，这不是在电视台在录像，而是警方在拍摄葬礼的情况，以证以参死葬

17) 1:12:30指第一部：第二章：第30页（米兰·昆德拉，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8) 上文中，中文版里把“共产主义国家”翻译成“某些国家”，对此参考了韩文版。

社的都是一些人。(5:19:272-273)

就在几个星期前，她还以为普罗恰兹卡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不能有任何私人空间的集中营里感到惊讶。可是她自己呢？从母亲家搬出来后，她就天真地以为自己从此成了个人生活的主宰。然而，母亲的家在全世界，随时都会抓住她。特蕾莎无处可逃。(4:26:198 横然是本研究青所注)

6.25 韩国战争以后，以苏联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冷战局面，各国严格监视国民的人身和言论自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的一切都由“党”来掌握，包括户口、粮食、住宅、婚姻还有私生活等等。这与招个国家足球队运动员，也要由门房，工作单位同事，公安局，党支部，企业委员会开证明，评审，复审的昆德拉的叙述相类似。又如，《一个人的圣经》中对“五七干校”是这样描写的。“‘五七干校’绝非古今中外通常的学校，报名也好不报名也好，指定谁便非去不可，还不可以退学，在相互监视下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杜绝思想，作为对受过文化教育思考者的惩罚。党只允许一个思想，即最高领袖的思想。（中略）制约人的口粮、户籍和外出行动的自由。”(18:154-155) 这与昆德拉叙述的苏军的“集中营”——即“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4:4:160) 也相类似。“五七干校”和“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进行劳动改造的地方。在这里，个人的秘密是不存在的，都要公开于众。于是昆德拉说，世界在变成一个集中营，这并非夸张。因为，即使在“五七干校”和“集中营”的外面，也到处有耳，自己的邻居，自己的家人，都有可能举报你，那是人性被扼杀和摧毁的年代，不撒谎，不戴假面具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年代。高行健笔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昆德拉笔下的苏军统治捷克时期都集中反映了个人私生活完全透明的世界，这种存在轻若鸿毛。《一个人的圣经》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主人公处在极度不安和恐惧中，因为他们对存在感到焦虑和不安。如高行健所言：“人人都可能成为敌人，随时都可能被打倒。”(36:288) “你不过是小而又小的一只虫，这条蚁命又算得了什么呢？”(35:280) 另外，高行健通过描述大陆政府买下的香港酒店的情

况，影射8，90年代依然处在高度监控下没有自由的自身处境。

而苏军统治下的布拉格更是戒备森严。空中有飞机，地上有装甲车，一个画家要获准才能参展，一个公民要得到签证才能去海边度假，甚至对参加葬礼的人也都要进行监视，整座城市如同一个特制的透明玻璃馆，你无处藏身，无处逃离。高行健通过“邻居的注视”，县城“接线员在听”，昆德拉通过特蕾莎母亲对特蕾莎私生活的主宰，进一步揭示从社会到家庭层层监视的社会机制。这一点上看似偶然的巧合，但是《一个人的圣经》中确实存在昆德拉作品的文本形式。

2. 自我的丧失与天国幻想的破灭

数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治国理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自我”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刘再复在〈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¹⁹⁾的文章中，详细地论述了“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刘再复在该文章中说，“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哲学，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题之一，一百年前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并强调‘己’之优秀，是为了服务于‘群’，严复把自我（小我）视为他者（大我-国家）的工具，这种理念是晚清和民国初的思想主流。直到五四运动才被打破，五四新文化运动突出个人，张扬个性，打破‘国家偶像’，把个人自由视为目的本身。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连五四运动的主将们（如鲁迅、胡适）也常在‘群’与‘己’之间摇摆彷徨。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里，中国因为生存问题和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压倒一切，‘五四’所提倡的‘自我独立’和‘个性自由’很快就偃息旗鼓。1949年之后，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权结盟，全社会强大的经济国有化运动之后又进行相应的个人心灵的国有化运动，结果是消灭了个性，消灭了自我。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树立了一个名

19) 刘再复，〈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2011年首尔国际文学论坛-全球化中的生活与写作》论文集，大山文化财团，2011. 5. 24-26，第43页

为‘雷锋’的标准化形象，这个形象的象征意蕴便是绝对扬弃自我，唯有他者。而他者是国家机器和领袖。此时，自我被形象地规定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²⁰⁾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是对自我的消灭，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是极“左”文艺思潮占据了文学舞台，突出英雄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日益严重，8个样板戏创作模式向其他文学领域的推广，形成全国上下千篇一律僵化的文学格局。²¹⁾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对自我丧失的痛苦描写得非常透彻和迫切，他呼吁自由和人格的尊严。而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虽描写得委婉和隐喻，但相当深刻和精辟，请看引文：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

一个剪裁的规规矩矩的新社会，崭新光亮，人人都是光荣的劳动者，从赤脚耕地的农民到课堂里替人修明窗子的，都进入到各种单位里，全都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干得出类拔萃先进模范，汇报表彰。没有闲人，不许有闲气和私淫，都按定量分配口粮，一碗饭不会浪费。都泯除利己之心，都靠工资或工分生活。一切社会公有，包括每个劳动者，都严格管理，弄得天衣无缝，歹徒都无可逃避，除了枪毙了的全都进了监牢，或扣到农场劳动改造，红旗飘飘，人类理想的王国虽然只是初级阶段就这样实现了。

新人被制造出来，一个完美的模型，一个小战士叫雷锋，（省略）他上了个当，不小心提了个问题，做英雄是不是可以不扣到炸药包上，不必炸得粉碎？一部车是不是比个螺丝钉的用处更大？立刻引起全班同学哗然，女生的叫得就更大。他受到批判，幸好这只是班级的讨论会上，问题不算严重，他却从中得到个教训：做人就得说真话，要都说真话，就别活了。（17:147）

你不可以思想，不可以感受，不可以倾吐，不可以孤独！要不是辛苦干活，就打呼噜死睡；要不就交配下种，计划生育，养家活口。你说互相关心？忘了你生存的环境？怎么啦又想造反？当英雄还是烈士？你互相关心这些足以叫你吃枪子！（44:343）

他最终要说的是，可以扼杀一个人，但一个人那怕再脆弱，人的尊严不可以扼杀，人所以为人，就有这么点自尊不可以消灭。人尽管活得像

20) 刘再复，同上文，第43-44页

21) 程光炜著，《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56页

条虫，但是不知道虫有虫的尊严，虫在踩死、捻死之前装死、挣扎、逃窜以求自救，而虫之头虫的尊严却踩不死。杀人如草芥，可曾见过草芥在刀下求饶的？人不如草芥，可但要证明是人除了性命还有尊严。如果无法维护做人的这点尊严，要不被杀又不自杀，倘若还不肯死掉，便只有逃之。尊严是对於存在的意识，这便是脆弱的人力量所在，要存在的意识泯灭了，这存在就形同死之。(53:404 横为是本研究青所注)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

她光着身子，跟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绕着游泳池走。
(略)对特蕾莎来说，光着身子走在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中间，这是最基本的恐怖形象。小时候在家里，母亲禁止她洗澡时锁上浴室门。那时，母亲常对她说：你的身体和其他人一样；你没有理由捂着藏着。在母亲的世界里，所有的身体都一模一样，一个跟着一个走。对特蕾莎来说，打从孩提的时候起，裸体就是集中营里强制性整齐划一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略)她夹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的身体都一模一样的世界。而恰恰，他却在她和所有其他女人之间画了一个符号，(略)他重又把她扔回了她原以为已经逃离的世界，他让她光着身子和其他赤身裸体的女人一起排队行走。(2:15:70)

萨比娜心对共产主义的最初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城堡被改造成厕所)，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就是媚俗。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模型。她见过五一节的游行队伍，那个时代，人们表现都还很狂热或尽可能狂热的表现。(略)游行队伍走近主席台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要证明那是他们应有的喜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表达他们应有的赞许。(略)五一节汲取的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队伍中人们发出心照不宣的口号，并不是“共产党万岁”而是“生命万岁”。共产党政治之所以有力量，有计谋，就在于夺取了这个口号。(6:6:297 横为是本研究青所注)

从上述例文中可知，高行健从“群”与“己”的角度揭露所谓共产主义的天国或乌托邦本质。“为人民服务”，“公有制”，“消除利己之心”，“雷锋”等字眼是文

革时期广为使用的词语，而个人“尊严”，“自由”，“人权”是禁止使用的。人人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随时都有可能被换掉。这是一个将个体融和、融化到群体中去的世界；“而不愿做其中一个音符的人则成为一个无用且无意义的黑点。”²²⁾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萨比娜对所有女人裸体一视同仁的母亲和托马斯，感到屈辱，在排成一队的裸体队伍和五一游行队伍中，找不出与别人不同的自己，所以萨比娜感到自己存在轻若鸿毛。萨比娜甚至认为裸体就是集中营里强制性整齐划一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昆德拉通过画家萨比娜之口揭露共产主义整齐划一的、扼杀个性的制度。昆德拉用裸体列队行走和五一节游行队伍来形象地比喻共产主义媚俗的艺术，包括充斥各大电影院的苏联电影及共产主义的圆舞曲。

针对共产主义宣扬的天国或理想社会，高行健和昆德拉做出深刻而犀利的讽刺。高行健说，天国在女人的洞穴里，在这里他便能感受到自由，“永恒的只有这当下，你感受你才存在。”²³⁾“你不信上帝，不信菩萨，不信所罗门，不信阿拉，从野蛮人的图腾到文明人的宗教，你同时代的人更有许多创造，诸如遍地立的偶像，天上也莫须有的乌托邦，都令人发疯得莫名其妙……。”²⁴⁾高行健拒绝对一切“主义”及宗教的认同，唯珍惜这当下，而对这当下的感受是通过性爱来完成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把性欲与性爱纳入存在的范畴，“因为性欲伴随人的出生而产生，伴随人的死亡而消失。并且性欲是通过性爱这一行动把自己的身体与他者的身体展示出来的。”²⁵⁾

在中国，1958年实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提出在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赶美”的口号，甚至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能者多劳，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当时群众凭着满腔热

22) 弗朗索瓦·里卡尔，〈大写的牧歌与小写的牧歌-重读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同上书，第384页

23)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59章，同上书，第438页

24)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43章，同上书，第334页

25) 사르트르, 정소성 옮김, 『존재와 무』, 동서문화사, 2010

血，对共产主义怀有无限的憧憬。但是历史证明，这一政策带来巨大灾难。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灾难的高行健，看破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质，加上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验，使他感悟到唯有生命是真实和可贵的，这是对禅宗思想的接受。“禅宗所追求的是人未出生之前的本来面目。这一面目人人具有，生命之美就在于悟此性。人的自性与宇宙万物根源的法性合二为一，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合而为一的境界就是禅。这是自然的、真实的、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是禅宗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讴歌的审美境界。”²⁶⁾也就是说，对生命的追求才是人的本性。高行健否定所有的偶像，回到人的本性，注重生命，注重当下，因为当下才是真实的。禅宗思想贯穿包括《灵山》在内的高行健的多部作品。

昆德拉说：“上帝把人类驱逐出伊甸园时也把人类的肮脏本性和厌恶暴露出来。人开始隐藏会令其耻辱的东西。”²⁷⁾“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狂热分子所建，（中略）但若干时间之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狂热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²⁸⁾昆德拉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肮脏和厌恶的，这与高行健主张人的本性是自然的、求生的有所不同，但他们二人在否定天堂的存在上是一致的。

3. 寻找失去的自我

两次的世界大战以及德国纳粹的法西斯统治，给当时的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恐怖。这是摧毁古典人道主义所信赖的尊重人的尊严及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该为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人的理性却成了把人异化和逼向死亡的工具。因此，作为孤独者、异邦人、异化人生存于社会的个人面临虚无的苦恼，为了恢复人的整体性及尊严，寻找“我在这里的根据”就是“存在主义”出发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

26) 金英明, <《灵山》所见源流文化研究>, 同上论文, 第129页

27) 米兰·昆德拉, 许钧译,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同上书, 第293页

28) 米兰·昆德拉, 许钧译,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同上书, 第210页

恭、放荡不羁的风尚。于是，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作最时髦的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其中“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精髓。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即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它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继承。萨特还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那么自我怎么能够把握呢？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把握自我的方法：即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存在的密码。他对每个人物的密码给出了几个不同的关键词。“特蕾莎的关键词是：身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牧歌、天堂。托马斯的关键词是：轻、重。弗兰茨和萨比娜的关键词是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美丽、祖国、墓地、力量。而每一个词在另一个人的存在密码中都有不同的意义”²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头是关于尼采永恒轮回的思考。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可是建立在不轮回之上的世界，人们既不能把它同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托马斯觉得个人生命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如同波西米亚的历史一样，无法上演第二回，将终结于某一天，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土，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轻得不能承受。托马斯一生睡过的女人有二百多人，那么他想要在女人身上找寻什么呢？

若特勤和爱因斯坦，勃列日涅夫和索尔仁尼琴，他们之间的相似远远多于不同。如果能用数据来表示，他们之间有百万分之一不同，百万分之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相似。
发现那百万分之一，并征服它，托马斯执迷于这一欲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意义即在此。（省略）

29) 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31-32页

人们当然有权利追问为什么只在性方面寻找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屑之处。难道不能，比如说，从她的步态、意味口味或对美的偏好等方面去寻求？（省略）然而，我们很快就看到，这种独特性完全没有意义，对其感兴趣并在其中寻找某种价值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只有在性上，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屑才显珍贵，因为不是公平就能了解的，而需要去征服。（省略）性仍就像一个保险箱，女性之“我”的所有奥秘都藏在里头。
 所以，彼得托马斯追逐女性的不是感官享乐，而是征服世界的这一欲念。
 (5:9:238)

托马斯通过性爱寻找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并想通过女性寻找藏在里面的“我”之奥秘。再想想托马斯的职业，他是外科医生，是做尸体解剖的。因此，这里面隐喻用想象的解剖刀，撕开她们外面的包裹物，渴望征服在她们体内的某一东西。或者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尸体。较之于托马斯，特蕾萨认为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是沉重的，她看重自己的隐私，拒绝整齐划一，追求个人的、唯一的東西。那么，《一个人的的圣经》中，主人公与多个女人的性爱又意味着什么呢？

自由短暂即逝，你的凝视，你那话语的那一瞬间，都来自内心的一种态度，你要捕捉的就是这瞬间即逝的自由。所以所谓语言，恰恰是要扣这自由予以确认，哪怕互文的字不可能永存。可你书写时，这自由你复或看见了，听到了，在你写、你读、你听的同时此刻，自由复存在于你表述之中，就要这么点奢侈，对自由的表述和表述的自由，得到了你就坦然。
 自由不是赐予的，买不来，自由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意识，这就是生之美妙，你品尝这点自由，像品味美好的女性性爱带来的快感难道不是这样？
 (39:306)

很显然，高行健把性爱与对自由的感悟等同起来，想把握那稍纵即逝的自由加以确认。并且在肉与肉的接触中体会生命的存在。高行健承认生命的有限，所以告诫人们不必在无中生有去找寻所谓对自我的认同，不如回到生命的本源，把握当下，你感受你才存在。这与高行健一贯主张的对生命的热爱和把

握当下是一致的，这是受禅宗思想影响的。

另外，通过写作确认存在的命题在《一个人的圣经》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也有体现。萨特在《恶心》中集中体现了其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小说的主人公洛根丁看到海边的小石头或刀叉、门环都感到恶心，他对毫无理由地存在于世界上的万物感到荒谬，并感到绝望，但洛根丁离开自己住过的布维尔市去往巴黎等候火车时，听到黑人女歌手唱的“在一些日子里some of these days”后，恶心症状消失，并感觉到瞬间的快乐。也就是说，该音乐的犹太人作曲家和黑人歌手，因为有了洛根丁这样的听众，他们得到了拯救，存在也就有了意义。于是，洛根丁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不能试一试……当然不是乐曲，但我不能试试另一种类型吗？……肯定是写书，因为我不干别的。”在萨特看来，如果有读者来阅读他的作品，读者就会想到他的生活，就像是他想到黑人女歌手的生活一样，便洗去了存在这个偶然性的罪孽。萨特在《话语》中透露过《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就是自己。也就是说，通过文学想获得拯救的洛根丁的思维就是萨特自己的思维。萨特的这种存在主义思想，为以后的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高行健和昆德拉也包括在其中。我们先看一下《一个人的圣经》：

你喜欢爵士，蓝调的随意，就像你弄那个戏。（中略）你就愿意写一首蓝调，像黑人歌王琼·哈特曼唱的那老调子：（57:422-423）
 把此时此刻作为起点，相互作做袒露，或是沉思或青独白，从中得到欣悦与满足，不再恐惧什么，自由是对恐惧的消除。（中略）这番书写不是你活的目的，所以还互，写头的是更充分感受此时此刻。（61:443）
 多么美妙的音乐，帕凡特瓦，你此时在听得的六协奏曲第六，飘逸的音乐中，生存郁积的焦虑飘逸升华在很薄的音阶上，琴弦上的之音犹如光影一划而过，复得到宣泄。你听时代的帕凡特瓦，无需去了解他的生平，可在你你对话，划过的每一声音，在琴弦的音阶上又唤起和弦的叩响。（61:444）

高行健说，他通过音乐才能得到欣悦与满足，并能得到自由和消除恐惧，

而通过写作却能感受到此时此刻，即存在。犹太人、黑人歌手、爵士乐、写作、自由、欣悦，这是《恶心》中的关键词，也是存在主义的象征话语。高行健把《恶心》中的关键词编织到自己的作品中，突出“存在”这个主题。高行健曾多次提到过“我表述，我才存在。”³⁰⁾他认为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拯救自己。但与萨特不同的是高行健并不主张文学作品一定要有读者来读，认为文学除了拯救自己以外并不能拯救什么，文学是一种自言自语，是一种个人的行为，高行健反对文学的社会功能。³¹⁾

而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面对母亲的专横，面对托马斯的不忠常常感到晕眩。这份无助的感觉，让她感到发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往下坠落的愿望。这与《恶心》中，洛根丁常常感到恶心相似。但特蕾莎与母狗卡列宁在一起时，感到非常快乐和安宁。因为特蕾莎对卡列宁无所求，对卡列宁的爱是无私的，并且特蕾莎对狗的爱是自愿的，没人强迫她。这是牧歌般的爱，只有人与动物之间存在，因为动物没有被逐出伊甸园。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牧歌献给另一个人。牧歌是印在人们心中的一幅景象，犹如伊甸园的回忆，那里始终与幸福相伴。

这些图景展现的是一个安宁幸福的景象，冲突消失，洋溢着幸福。昆德拉认为这种幸福存在于超越“自我”的境界中，而这种境界是通过写作才能展示出来的：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爱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会让我感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些人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完了过去。这条被跨越的界限（一旦跨越了那个界限“自我”就终结）吸引着我。小说要探索的奥秘是在另外一边工作

30) 高行健，《没有主义》，联经，2001，第123页

31) 高行健，〈巴黎随笔〉，《没有主义》，同上书，第20页（救国救民如果不先救人，最终不论为谎言，至少也是空话。要紧的还是救自己。一个偌大的民族与国家，人尚不能自救，又如何救得了民族与国家？所以，更为切实的不如自救。文学便是人精神上自救的一种方式。不仅对强权政治，也是对现存生活模式的一种超越。（中略）文学从社会公众生活中退出，成为纯粹个人的行为。）

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
(5:15:263)

昆德拉笔下，像牧歌一样幸福与安宁的景象在人与人之间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是充满斗争、怀疑与冲突，而这种景象只有通过作品才能跨越并展现出来。因此，通过小说可以探寻另一边的奥秘，可以探索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它是理解人类生存及世界生活的方式，而“自我”在这一边。

IV、结语

本论文通过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与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互文对话，分析了中西方作家对存在及生命的认识。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艾略特认为：“把文学家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那么就可以看到，文学传统具有强大的影响，每一个文学家的创作必定会受到它的深刻影响。”³²⁾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也分析了高行健、昆德拉与萨特存在主义在多维空间的对话。不过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表达的主题较之于《一个人的圣经》是含混不清的、多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围绕几个人物的不同经历，经他们对生命的选择将小说引入哲学层面，对诸如回归、媚俗、遗忘、时间偶然性与必然性等多个范畴进行了思考。而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体命运的大悲剧，但这不只限于一个人，那是那一时代很多人的共同悲剧。在存在主义方面高行健和昆德拉虽然都继承了通过文学得到拯救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但高行健反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学是个人的行为，昆德拉却要通过文学实现自我的超越，并要探索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

32)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第10页

参考文献

- 高行健, 《一个人的圣经》, 联经, 2011
- 高行健, 《没有主义》, 联经, 2001
- 米兰·昆德拉, 许钧译,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米兰·昆德拉著, 董强译, 《小说的艺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罗兰·巴特, <作者之死>, 《文之悦》, 东文选, (韩文版)
- 程光炜著, 《中国当代诗歌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高行健专访>, 台湾联合报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日, 第三版
- 刘再复, <多元社会中的‘群’‘己’权利界限>, 《2011年首尔国际文学论坛-全球化中的生活与写作》论文集, 大山文化财团, 2011. 5. 24-26
- 李永求, 《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小考》, 中国研究第40卷
- 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 밀란·쿤데라·이재룡 옮김, 『참을 수 없는 존재의 가벼움』, 민음사, 2012
- 밀란·쿤데라·권오룡 옮김, 『소설의 기술』, 민음사, 2011
- 가오싱젠·박하정 옮김, 『나혼자만의 성경1, 2』, 현대문학북스, 2002
- 사르트르·정소성 옮김, 『존재와 무』, 동서문화사, 2010
- 『한중언어문화연구』 30집, 한국현대중국연구회, 2012, 10
- 김영명, 『「靈山」에 나타난 始原文化 研究』,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석사논문, 2012. 2
- 김성곤, 『「장미의 이름」과 「참을 수 없는 존재의 가벼움」』, 포스트모더니즘/포스트 리얼리즘 책읽기, 외국문학, 1989, 겨울, 열음사
- 金英明、朴南用, <《灵山》与《楚辞》比较研究>, 《世界比较文化研究》第36辑, 2011, 9
- 金英明, <高行健与李仁星小说比较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 第47辑, 2012, 5

<Abstract>

The Presence of Anxiety:
The Intertextual Dialogue of Gao Xingjian's *One Man's Bible* and
Milan Kundera's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Written by Kim Yeongmyeong(Translated by Lo Pok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existence by analyzing the dialogue in Gao Xingjian's *One Man's Bible* and Milan Kundera's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Roland Barthes deems that every text holds intertextuality in various forms with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Eliot comments that the literature writers should observe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contexts of which in order to get more inspirations. Gao and Kundera convey existentialism in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However, the themes expressed in Kundera's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are less transparent and meaningful than Gao's *One Man's Bible*.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encompasses the life of a few individual characters and introduce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rough their choices of life. For example, the reminiscence of the past, custom rituals, oblivion and the co-incidence of time are analyzed. However, Gao's *One Man's Bible* depicts the turmoil in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has been experienced by different parties, but not a single individual. Although both Gao and Kundera have inherited the core philosophies of Sartre's existentialism, Gao opposes to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For Kundera, he tends to achieve self-actualiza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 th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 Gao Xingjian, Kundera, Sartre, *One Man's Bible*

투 고 일 : 2013. 1. 8. / 심 사 일 : 2013. 1. 20. ~ 2013.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3. 2. 17.